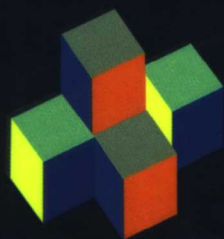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年危机 (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英] 爱德华·卡尔 著

秦亚青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年危机 (1919—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英] 爱德华·卡尔 著
秦亚青 译

世界出版社

This book is copyright in all countries which are signatories to the Berne Convention.

This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9 by Macmillan and Company Limited, London, and 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with a second edition in 1946.

First HAREPE TORCHBOOK edition published 1964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 Y. 10022.

中文版据 1964 年版翻译。

中文版©2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年危机 (1919 ~ 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 [英] 卡尔
(E. H. Carr) 著; 秦亚青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1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 ~ 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BN 7 - 5012 - 2446 - 3

I .20… II .①卡…②秦… III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19 ~ 1939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7139 号

书 名 20 年危机 (1919 ~ 1939):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责任编辑 袁路明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16 印张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秦 亚 青

献给即将到来的
和平的缔造者

哲学家为虚构的联邦制定虚构的法则。他们的理论犹如天上的星辰,因远在高空而光芒暗淡。

培根《论学术的进步》

通往人类权力和人类知识的道路相依比邻,几近合一。但是,有害无益且根深蒂固的抽象思维习惯依然存在,故而比较稳妥的方法还是从与实际相关的基础开始,建立与发展各门科学。让实用性思维影响并决定思辩性冥想。

培根《新工具》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道“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惟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第一版序言

这本书于 1937 年开始构思，1939 年 7 月中旬送交出版社，1939 年 9 月 3 日战争爆发之际阅读校样。如若根据战事匆匆做些零星半点的文字修改，必当于事无补。所以，我愿全然保留书稿原貌。成稿之时，世界已是战云笼罩，但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望并未尽失。因此，书中“战争”“战前”或是“战后”等字眼，其所指均为 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气焰上升的时候，将战争灾难全然归罪于少数人的野心和傲慢，不求进一步探查战争的根源，这实在是容易的事情，但却也十分危险。即便是战火纷飞的时候，探究战争的深层原因和重要缘由，而不是仅仅考量战争的个人原因和直接缘由，仍然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凡尔赛和约》签署之后仅 20 年又两个月，和平即告破裂，欧洲诸国从而卷入第二次重大的战争。如若和平重返世界，其时，应当认真思考和平破裂的教训。如若结束战争的安排摧毁的仅仅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者，而没有消除滋生国家社会主义现象的条件，那么，这样的安排必然无以持续，1919 年结束战争安排的悲剧就会重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隔 20 年。对于研究世界未来的和平缔造者而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这 20 年的危机更能够使他们受益。下一次和平会议，如若不至重蹈上一次和平会议之覆辙，就要关注较之划定边界更为深刻的问题。基于这一信念，我因此愿将此书献给未来和平的缔造者。

我从已经出版的著述中得到帮助、汲取灵感，这类著述不胜枚举。但我尤其得益于两部著作，一是卡尔·曼海姆博士（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二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博士的《有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这

两部论著虽然不是国际关系的专著，但却揭示了一些根本的政治问题。直到我的书稿几近完成之时，才拿到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先生的著作《经济人的终结》。书中包含了一些精彩的推测，对当今世界历史的危机所做的分析也是发人深省、富有启发意义的。过去20年里，出版了许多历史性和记叙性的优秀著作，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侧面。其中一些著作对我颇有启发，已在本书的注释里记录在案。这些注释代替了参考书目。不过，就我所知，这些著作中没有一部旨在分析现代国际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要更为深切地感谢诸多个人，尤其要感谢三位朋友，他们抽出时间，通读书稿。对于我的观点，他们或是赞成或是反对，但提出的意见都富有启发意义。本书能有现在的价值，他们的建议贡献甚大。这三位朋友是：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牛津大学万圣学院研究员、最近刚刚担任威尔士大学学院（阿伯瑞斯特沃斯）国际政治学讲师的丹尼斯·劳思（Dennis Routh）；第三位朋友因有官方职务，故不便在此提及姓名。过去三年里，我是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民族主义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小组的研究成果即将发表。¹ 小组的研究脉络，与我在本书中的分析思路，有时相通，有时交叉。研究小组中的同事们以及参与该研究项目的人员，在我们长时间的讨论切磋之中，也自然而然地为本书做出了许多宝贵的贡献。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以某种方式有意或是无意地给予我帮助和鼓励。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1939年9月30日

注 释：

1 *Nationalism: A Study by a Group of Member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版序言

《20年危机》第二版需要付印，这使作者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该书讨论国际政治，于1939年夏结稿。即便当时尽量避免做出预测性论断，也难免烙上时代的印记，无论是内容、措辞、还是时态，尤其是在“战争”、“战后”等词语的使用上面，概莫能外。对于当今的读者，须尽心刻意，才能将其与1914~1918年发生的那场大战联系起来。但是，当我试图修订原书时，却清楚地发现，该书各章各节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如若逐段重写，那么，我所完成的必然不是这本书的第二版，而是另外一部全新的书稿了。这样一来，实可谓强用旧瓶装新酒，既不得体，也无裨益。《20年危机》仍然是一部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著作，撰稿之时，这一时期已近终结。所以，只能依照这种实际情况评说这部论著。因此，我所做的是：改写那些产生歧义或是晦涩难懂的词句，因为对于如今的读者而言，当年成书时的情势已经相当遥远；修正一些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句子；删除两三段落，因为这些段落涉及当年的一些争论，时过境迁，这些争论或是不复存在，或是已从另外的角度得到了新的解读。

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丝毫未曾改变原书的内容，也不曾仅仅因为书中有些观点当今已经不能完全被人们接受就予以修正。因此，请允许我在此提出两个感悟到的主要问题。我以为，自第一版问世之后，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两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首先，《20年危机》旨在反击1919~1939年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中都存在这种错误。现在，这种错误已经基本上得到了纠正，虽然在讨论未来安排的一些

问题时还会时而出现。《20 年危机》中的一些章节所提出的论点更多地强调了一个侧面，这在 1939 年是必要的，但时至今日，已是没有必要或是不合时宜了。

其次，该书的主体部分过于匆忙、过于自信地将现在的民族国家视为国际社会的惟一单位，无论国大國小，均是如此。当然，该书最后一章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单位的规模提出了一些反思，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加强了这种反思。现在，所有客观的研究人员似乎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论：独立的小国已被淘汰或是即将被淘汰，成员国众多的国际组织是不可能有效运转的。我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民族主义及其之后》的小书，其中阐述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观点。至此，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采取惟一切实可行的方法，使《20 年危机》的第二版基本保持 1939 年结稿出版时的原本面貌。

爱德华·哈利特·卡尔

1945 年 11 月 15 日

第一部分 国际政治学

第一章 学科的起源	/ 3
政治学的目的与分析	/ 4
乌托邦主义的作用	/ 6
现实主义的影响	/ 9

第二章 乌托邦与现实	/ 12
自由意志与客观决定论	/ 12
理论与实践	/ 13
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	/ 14
左派和右派	/ 18
伦理与政治	/ 19

第二部分 国际危机

第三章 乌托邦主义产生的背景	/ 24
乌托邦主义的基础	/ 24
被移植的边沁理性主义	/ 27
理性主义与国际联盟	/ 29
舆论的神话	/ 31
乌托邦主义遭受的报应	/ 35
分析的难题	/ 37

第四章 利益的和谐	/ 42
乌托邦主义的合成理念	/ 42
自由放任主义的天堂	/ 44
政治领域的达尔文主义	/ 46
国际利益和谐论	/ 49

维护和平的共同利益 / 50

国际经济利益的和谐 / 52

和谐的破碎 / 57

第五章 现实主义的批评 / 62

现实主义的基础 / 62

思想的相对性 / 65

根据目标调整思想 / 68

国家利益和普世福祉 / 71

现实主义对利益和谐论的批判 / 75

现实主义对国际主义的批判 / 79

第六章 现实主义的局限性 / 85

第三部分 政治、权力和道德

第七章 政治的实质 / 92

第八章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 / 98

军事力量 / 103

经济力量 / 106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 / 107

经济政治分离说的几点谬误 / 109

自给自足 / 111

作为政策工具的经济力量 / 115

经济力量与国际道德 / 118

支配舆论的力量 / 120

当代世界中的宣传 / 121

作为政策工具的宣传 / 123

国家宣传还是国际宣传? / 125

有关宣传的国际协议 / 127

宣传中的事实与道德	/ 128
-----------	-------

第九章 国际政治中的道德	/ 135
国际道德的性质	/ 136
国际道德理论	/ 140
普通人对国际道德的认识	/ 141
个人道德和国家道德之间的差异	/ 143
是否存在一个国际社会	/ 147
平等原则	/ 147
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 150

第四部分 法律与变革

第十章 法律的基础	/ 158
国际法的性质	/ 158
自然主义者的法律观	/ 160
现实主义者的法律观	/ 162
法律是政治社会创造的	/ 163

第十一章 条约神圣不可侵犯	/ 167
条约的法律效力和道德效力	/ 167
被迫签订的条约	/ 171
不平等条约	/ 172
作为权力工具的条约	/ 173

第十二章 国际争端的司法解决	/ 177
可以诉诸与不可诉诸司法解决的 争端	/ 177
“用仲裁解决一切争端”的计划	/ 181
司法程序不适用于“政治性” 争端	/ 185